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北京市东城区 文史资料选编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前 言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半个世纪前，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向我宛平县城守军开火，遭到我第二十九军的坚决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卢沟桥反侵略的枪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的战斗号角。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万众一心，同仇敌愾，进行全民族抗战，历经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显现了中华民族的浩气和尊严。这段历史，是值得人们回忆、思考并永远纪念的。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编辑了这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选登了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撰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北平沦陷时期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日伪残暴统治的罪行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歌颂了全国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精神和爱国人士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读了这些具体、生动的史料，回顾历史，会使我们倍感今天国家自主和民族独立的幸福和珍贵。

回顾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总结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会更加热爱我们可爱的祖国,更加热爱领导我们成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更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自信心,为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由于时间仓促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政协委员、各界人士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1995年6月1日

目 录

我在抗日战争初期一段流亡和工作的经历

..... 彭道襄(1)

风雨如晦的学生时代 张寿崇(10)

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 孙金铭(14)

华北文教协会 孙金铭(23)

何其巩与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大学 赵乃基(32)

并非传奇的故事

——忆董鲁安先生 李寿朋(37)

不为敌人唱赞歌 曹宝禄(44)

忆先师程砚秋在沦陷期间高风亮节的事迹

..... 刘迎秋(49)

难忘的“一二·九” 刘衡玑(56)

育英中学校的抗日斗争 李天赏(63)

三十年代北平汇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 穆家麒(72)

爱国主义旗帜飘扬下的东北中山中学

..... 爱新觉罗·溥筠(77)

记“九·一八”事变后黄埔军校东北籍

学生的一次抗日示威游行 铁 萍(86)

抗日救亡中的北平青年会及军人服务部

..... 周佳泉(89)

忆“七·七”事变前后廿九军抗击日寇片断

..... 陈庆余(100)

晋北抗战的回忆 靳金城(107)

我随六十军出征抗日血战台儿庄亲历记

..... 李世荣(113)

忆抗战史实 缅怀先烈 致力振兴中华

..... 张永棣(127)

抗日英烈柳树人团长精神永存 何兰生(133)

轰动社会的刺杀大汉奸张敬尧和刺

杀日本特使案 白冠军(137)

日本天皇特使遭枪击之后 周佳泉 周佳福(141)

不能忘记的历史 谭伊孝(145)

抗战时期故都见闻 吴逸民(159)

吃“混合面”的苦难纪实 万永光 迟子安(169)

日军关闭燕京大学前后见闻..... 武占元(173)

侵华日军关闭地坛 李鸿斌(178)

金壁辉其人 宪 均(181)

金壁辉对戏剧界的敲诈勒索..... 李万春(198)

我在抗日战争初期一段 流亡和工作的经历

彭 道 襄

1937年暑假我大学毕业了，学校给介绍到安徽大学图书馆工作，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故乡合肥。准备8月初赴安庆就职，并接我母亲同去，她欣然同意。当时的封建习俗是反对女子念书的，我母亲不但支持我们念书，还送我们上大学，受到亲友的非议。此时是她扬眉吐气开心的时候。然而不久抗日战争开始，我的愿望无法顺利实现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大规模的残酷入侵，很快硝烟弥漫了华北大地。全国人民沸腾了，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国民党不得不顺应人民要求，改变其不抵抗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国民参政会”成立，各种抗日组织相继成立。蒋介石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对日全面宣战。

7月下旬，我姐姐一家三口自北平南下抵合肥。姐夫程希孟是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姐姐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工作。他们和许德衍、徐斌、张晓梅、杨秀峰、张申府、刘清扬等都是平津大学教授、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地下成员，他们一起离平。

“八·一三”淞沪抗战，我军英勇抵抗，浴血奋战，震惊中外。敌人占领上海后沿铁路线向南京进犯。华北战场继续扩大逼近中原。合肥是皖北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自非久留之地，但走到那

里去？如何安顿一家老小，我们才可以投入抗日的队伍中去。

9月中，姐夫接到南京方面的通知去武汉开会。他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带女儿乃欣（8岁）、大侄女绿筠（比我小两岁）、侄守仁（10岁）五个人启程到芜湖转轮西上。那时芜湖已很紧张，一批批南下难民露宿江边，忍饥挨饿，受着敌机轰炸，死里逃生。

12月中，哥哥全家回到合肥，我们商量出走的问题。哥哥说进大别山打游击，那里离家近。但已无交通工具，天寒地冻，一家老小10口人如何到达六安、霍山？最后决定沿铁路线走，绕陇海路去汉口。我去武汉学校找工作，把家安顿下来就好办了。

1937年12月17日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那天早饭后我出去办事，一出大门我愣住了，街上空无一人，家家关门闭户，有的锁在门外，急往前走，听有“号外、号外”叫卖声，路边有两人在看号外，我凑上去看，大标题是：“南京失陷，敌人自全椒向合肥进犯”。全椒离合肥90里。跑步回家告知此事，决定立即做饭，吃饱了就走。在淮南铁路工作的家原叔也来了，催促我们快走，火车头明日将拉往别处。饭后都穿上保暖衣服，简单带点行李轻装上车。表兄嫂为我们看家（敌人进城时，他们从后院越墙而逃），匆匆离开家门汇入流民大潮中。第二天车抵田家庵终点站。在母亲老友叶大妈家住下。次日找挑夫、轿子走旱路奔向徐州。

徐州是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交汇点，商业繁荣的大商埠。此时已看不到南来北往的车辆穿行。听不到汽笛长鸣和车站上忙碌的装卸声。市面萧条，十室九空，商店都关闭，只少数饮食店和小摊贩在紧张忙碌卖几种简单食品。提防着敌机随时侵扰轰炸。满街都是衣冠不整扶老携幼，肩挑背扛的过往人流。车站上售票处不卖票。站台上看不到穿制服的路警。只有拿红绿灯，打红绿旗的值班员在工作。火车虽不正点，有的线路还在运行。只要有车到站，总

是满满一车厢人下来。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不嘈杂、不喧闹、更无打架斗殴者。人们都紧锁眉头，静静地坐那儿，小声说话等候上车。

陇海路新购进两列客车；兰钢皮、绿钢皮。由于外层是用兰、绿色钢皮包装而得名。此时正巧在我们坐的月台边停了一辆兰钢皮，新颖而漂亮。我们一家老小得以从容上车。没有人过来推、搡，抢先上的。车上座位还不满。我们找了一个对面座，一家挤在一块。而行李架上却躺满了士兵。他们两个人一排，静静地躺在那儿。以致我们上车时竟未发现。源源不断的人流终于挤满了车厢，但不喧闹。车上也无人售票。等于铁路上免费输送难民。衷心地感谢勇敢的爱国铁路职工，把各路汇集的流亡人群一车车地送往后方。夜深了列车终于启动。我松了一口气，我们离战区越来越远了。

车开了，车厢里人开始攀谈起来。每到一站我们总得下车或在窗口争购食品。买到后必送些给上面的士兵。他们很好，不给也不要。他们都是南京守城的士兵。据他们讲，南京并未战斗，未放一枪一炮。而是在敌人未到之前弃城而逃的。事先说的好，报上也一再报道，南京兵强粮足，器械先进，城防工事固若金汤。加上南京地势险要有天然屏障，敌人不易攻破。守城司令唐生智公开宣称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大大鼓舞士气，安定民心。然而闻风先逃，第一个骑马先跑的就是他。守城士兵不开门说：司令有命令，违者军法从事。他说我就是发布命令的唐司令唐生智。于是城门大开，骑马的、坐车的、步行的大小官兵蜂涌而去。火车里的士兵是守下关的。开了城门却过不了大江。他们都是找块门板，木排、木板游到浦口上火车。原来南京是这样失陷的呀！怪不得那么快！大家听了无不切齿愤恨，可谁也不吭声。

到了武汉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姐姐他们。下了火车找客栈住下。

我去汉口找到胡秋原家，得知他们住在武昌夏家。战乱几个月的离别又聚首武汉。

次日一早去文华母校，看到校长沈祖荣和同学们很亲切。我向校长说明来意。他说武汉也在动员紧急疏散。学校正准备迁往重庆哩！原来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下一步怎么办？去湖南找安徽大学（学校搬迁时曾给我通知）。回到寓所，大家商量结果全家一分为三。友人吴景新介绍哥哥去沙市中学教书，他带嫂侄走。我和绿筠伺候母亲，带乃欣、守仁去重庆，姐姐姐夫俩留武汉工作。武汉大学正在买船票去四川乐山，转托熟人代购几张。买到了四等舱已不容易。到宜昌又住了几天换小轮入川。离宜昌上行不远即过三峡。过去仅从诗文书画中欣赏，而今能亲临其境欣赏大自然美景，亦此行苦中之乐也。船徐徐驶入峡中，两岸峰峦叠翠，高纵云霄，大山郁郁葱葱杂花点点，茅屋人家，羊肠小道，如入仙境。满山搜寻却未见一只猿猴。船在峡中行，如在画中游，四面高山环抱，看不见来路，似无去处。汽笛一声船拐弯出了峡。迎面又是大山挡道，进入瞿塘峡。如是走完三峡，经白帝城，酆都城至万县停泊。天气暖如江南的春天，柑橘鲜美价廉，这是流亡中的一次快绝生平的游览！

1938年1月底到达雾都重庆。下午时分昏昏暗暗的。同学廖维祐去接我，并在川盐五里代租了住房。山城一片升平气象，我不禁茫然。

时已腊尽岁终，即将过阴历年，街上很热闹，却无心欣赏。简单把家安定下来。首要任务是找工作维持生活。我和绿筠每晨去附近文化馆看报，打听消息。大概两月后，在报上看到由教育部办的，流亡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的登记办法。我拿了文凭去重庆女师办理登记手续。领导人是教育部的郭有守司长。据说登记后，分配工作前每月给20元生活费。我登记了半年未拿到一分钱。

1938年暑假，文华搬到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内，盖了栋小楼上课。我去找校长，他介绍我去求精中学图书馆工作。月薪40元，只有刚毕业时的一半，但我也满意，总归是有了工作，开学后我搬去学校住，一切顺利。到冬天我母亲病了，就近请南京迁渝名中医张简斋看病。病人多极了，早上挂号，晚上去看，每周去两次，很见效果。姐姐他们已于暑假到重庆，我们搬在校场口住。伺候母亲照顾家，每日挤公共汽车从起点到终点去学校，实在太困难了。正在这时教师服务团从登记的人中拨出500人成立“社会工作团”。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每月40元津贴费。工作内容不定，那个单位需要人就从这里调，我们这些纯属服务性的听用者。谁能找到正式工作，随时可离开。为了照顾家，照顾我母亲，我辞去了求精中学的工作。

社会工作团1938年冬成立，实质上是救济性的群众组织。隶属于国民党社会部。团长是该部副部长马超俊兼。报到后在社教堂集中学习一周。实际上就是听各方面领导人的讲话，我最爱听邓颖超大姐的讲话，有理论有实际，解决思想上搞不懂不理解的问题，使眼光开朗。其他如冯玉祥、张伯苓，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还有其他人记不清楚。一周后听候分配。

1939年新年刚过，绿筠应白沙聚奎中学之聘去教英文。带着我母亲、乃欣、守仁还有罗锦心（姐姐自武汉带去的干女儿）同去，避免在重庆遭敌机轰炸之苦，我搬到打铁街文德女中（战争开始后学校停办改为女子公寓）去住，得以全力投入抗战后方工作中去。

1938年初夏，宋美龄在庐山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开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人有：邓颖超大姐、史良大姐、张晓梅、李德全、沈慧莲、张蔼真、劳君展、彭道真等80多人。在这个谈话会的基础上，以后又改组扩大成为“妇女指导委员会”，是国统区

指导妇女运动的机构。邓大姐是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之一，也是该委员会起草纲领者之一。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很多；妇女慰劳会，妇女工作队，农村工作队，训练班等。我是从接触中知道这些的，不够全面。

妇女工作队是群众组织。成员都是各机关、各部门的职员家属。各单位领导人的夫人是当然队长。目的是发动国统区各机关的上层妇女参加抗日工作。工作队直属妇女指导委员会。具体领导人是：史良、沈兹九、陆惠年。我和裘子坤（北师大毕业的中学教师）是社会工作团团员，调在沈慧莲的妇女工作队工作。沈是马超俊夫人，又是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她的办公室内加一张桌子，给我和裘子坤工作。

工作队的主要内容：动员机关内职员家属参加抗日后方工作；召集开会布置工作、汇报工作等等。经常在会上见到邓大姐，她代表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队出席会议。她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给我们讲边区妇女工作情况。我们领了任务回去汇报，由队长决定布置下去，如召开队员会，谈形势，布置工作，唱革命歌曲等。我和裘子坤两人的工作很忙；对外联系归我，家里工作主要归她，我当然也要深入联系家属搞下面的工作。当时强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这基础上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工作很顺利，每个人都愿尽自己一份力量。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热情高涨，布置下去的工作如期完成。抱着娃娃拉着孩子去开会。响应号召，接受任务毫不推辞。我们做的工作如下：

妇女献金日：1939年春季，重庆各界举办献金日，其中一天是妇女献金日，也是妇女工作队的第一次活动。妇女们都梳装整齐，排着整齐的队伍。各队队长走在旁边带领队伍。大队长捧着献金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大家拿着小旗，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浩

浩浩荡荡地走向市商会。在那里举行献金仪式。那次妇女界所献的金额数目可观。在各界献金中居前几名。

募集慰劳品，参加慰劳新兵、伤病员工作。

做棉衣、军鞋，棉衣是领了材料发下去，再收集成品上交。

义务演出募捐：在国泰戏院请京剧名票友义务演出：《六月雪》、《凤还巢》，《女起解》等剧目很受欢迎，演出三天。我们从推销戏票，会场招待，一揽子包下来，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干。筹到一笔可观的款子，能为前方做点贡献，真是莫大的快慰。

为国民外交协会举办义务演出两天。我和陈远两人为傅学文的妇女工作队，在大梁子一个礼堂，请相声、曲艺、大鼓演员义务演出。我们都是国民外交协会会员。她那里人少，请我们帮忙筹办的。

国际妇女会义卖：当时住重庆的外商家属和我们参加国际妇女会的成员共同组织活动。内容分：急救、缝纫、烹饪几个小组。她们从英国募集一批妇女儿童旧衣物。在社教堂大家分摊拍卖。购者踊跃，一日完成，收获不少。

参加各种庆祝会，纪念会活动。新年、国庆、国际三·八妇女节，五·四纪念会等。

5月3日、4日遭敌机大轰炸的善后救济工作。那时重庆尚无防空设备。只深挖防空洞以躲避炸弹。因此敌机来去自如，任其肆虐。5月3日警报器被炸坏，因此5月4日人们毫无准备。死伤1万多人，损失惨重。一片废墟，断水断电，我们参与了处理善后工作。

5月4日下午我们正在市商会开纪念会。看到场内一个个地往外走，会议仍在进行。感到不妙，我和杨惠敏（一个中学生，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她游过苏州河、把一面国旗送给守四行仓库的战士挂在屋顶上。从此名扬中外。她去过欧美各国。回国到重庆住

在沈慧莲家，参加后方各项抗日活动。)两人急忙走出，听人说敌机已过万县。碰见一熟人说，你们还不快躲。他带我们到中央银行刚建成的两层地下室去躲。那里已挤满了人，正往下涌。我扶着他们俩，还未下几级脚已悬空，实在挤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三人往上挤，坐在架子下面，看着敌机一批批地俯冲低空投弹，又安然返回。地面上火光四起照亮了山城，听到辟辟啪啪爆炸声，旁屋倒塌声，人们嘈杂喊叫声。不久都静下来。这一幕悲惨景象真叫人气愤，不能平静。夜深了我们往回返。走到文德女中叫不开门。街上人讲，里面炸了。于是沿着大梁子往前走，从断墙残垣、火堆、死尸边穿行到了沈慧莲家。她看到我们平安回去挺高兴。当时她也在会场，她走时并未叫我们。这时我姐姐他们到处找我，把我带到她家。次晨我们去向沈慧莲告辞，我和姐姐去白沙。她恳求姐姐让我留下，住处被炸可住她家，保证我的安全，和她一起搞善后救济工作。

路上余火未尽，横尸遍地，满目凄凉。一夜之间市民们都离开了山城。路上无行人。各机关家属也星夜下乡。再找不到一个人加入这工作。烈日当空、腥臭难闻。入夜漆黑一片。我们一直走到江边，偶有留在半掩门里者，不是自己有病就是老人病走不了。一个女青年躺在血泊中腿被炸伤，为她找好救护车送往歌乐山中央医院，保住了性命，锯掉一条腿。

参加第八保育院开幕典礼。第八保育院在北碚甘塘。院长傅岩是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沈慧莲派我们两人代表她和妇女工作队去参加庆贺。由于临时决定，到北碚再转船到甘塘时间来不及。只能下午先到青木关，次日翻山下去才能赶到。我们坐人力车赶到青木关时已日落西山。住了店子，找好两乘滑竿次日黎明出发。我们要翻过对面连绵大山的最高峰。20里直上的山路中无歇肩处。上到顶峰转过“死人垭口”就是前山。转弯处很窄，只能容一

乘滑竿过去，下面是悬崖万丈，我们都不敢往下看。此处又不安全。于是我们俩下来，和轿夫一起屏声息气地消消走过去。转过去是一架架山脉，两山之间路较宽较平。迎着朝阳快步下山。看到制纸的沅竹池塘、知己近人家，放松了紧张情绪。午时抵达保育院。他们还在等我们开会。在保育院见到我中学同学宋淑文等三人。她们都是从社会工作团调去的。大家亲切交谈。国仇家恨，抗日的热情使这些从沦陷区去的青年干劲十足。干什么都尽力干好。

是年夏季陈纳德的“飞虎队”到达重庆。结束了无防御挨炸的局面。保卫了重庆，恢复了活跃。很多人到外县从事生产。前方战场仍在蔓延，战争更趋紧张。一个由学生组织的战干团几乎从武汉走到重庆。收养战区的儿童，保育院虽已增到第八个还很不够。

轰轰烈烈的1939年过去了。妇女工作队没有新的开展。机关家属极少留在城里。物价飞涨，工薪阶层的人都在生活中受煎熬，募捐一套是行不通的。除了参加庆祝会、纪念会和宣传工作外，没有实质性的工作。1940年3月我告别了工作队。

后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回忆58年前这场灾难，国破家亡，逃离战区辗转到达大后方，做抗日工作等等，仍历历在目，印象深刻。当时许多人颠沛流离，都有与我相同或类似的经历，现在写出来作为纪念。但时隔甚久，细微末节，年月，人名有的记不起来，不够完整，仅供参考。

作者简介

彭道襄：民盟市委直属第六支部副主委，民盟市委老龄委员会委员，老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北京图书馆任副研究馆员，现已离休。

风雨如晦的学生时代

张 寿 崇

1931年我9岁是天津公学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天津公学是英租界工部局为中国纳税人子弟办的小学，设在英国球场对面一座小洋楼里，规模不算大，后迁到墙子河边，改名耀华学校，就是天津第六中学的前身。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袭击北大营占领沈阳。次日我到校时，学生们不像平日那样快乐，老师们也都沉着脸面带愁容，我的级任老师何学师是河北师范刚毕业的学生，她领着我们来到礼堂，穿着长袍黑坎肩的严松章校长严肃地登上讲台训话。他说，日本侵略者，昨天武装占领了沈阳，还在东北三省各处进兵。国土沦陷了，东北人民成了亡国奴，这是国耻。他又讲了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最后一课》。然后低沉地说：“你们回家吧，今日不上课了，”平日一听到解散，小学生就欢蹦乱跳，可这次都低头不语，由老师领着回班收拾书包。有些女生在啜泣着。大家三三两两给老师鞠躬后，默默地离开了学校。这已是60多年前的事，但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九·一八”事变后，长城抗战前，平津青少年抗战救亡热情很高。记得社会上有种《好男儿》期刊图文并茂，主要宣传黄埔建军、东征北伐战绩和介绍引进新式武器军事装备，很起鼓舞激励作用。当时中学生军训也是由黄埔军校毕业生任教官，身边佩戴“军人

魂”短剑，一身整齐呢子军装。过去一直看的是军阀和杂牌军的部队，见到这些正规中央军部队，对抗日救亡增加信心，但这只是短暂的一道闪光。何梅协定后，中央军撤出华北，各校就又聘请退役旧军人作军事教官，直到“七·七”事变前南苑集训，中学军训课宣告结束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到天津新学书院(T. A. C. C)读书，这是英国伦敦会办的教会学校。校舍是一所老式建筑，当时还有几位头戴方帽身穿学士袍的英国老师，教文学史，世界史和数学等。因为虽然平津沦陷，但租界区内，还多少有些偏安局面，可以看到油印的救亡小报，个别书店还出售有关平津和淞沪抗战的照片。记得一次在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英国教员朗曼(Long man)就到各班威胁制止。学生们就用擂敲课桌表示反抗。先是一两个课室，后来发展到全校都一致行动。洋教师们见众怒难犯，他们也就退缩不再干预了。这也是青年爱国热情的一次大迸发。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日军进驻燕京大学。我当时已是燕大西语系一年级学生，与新学书院老同学刘新、冯建龙同住三斋宿舍。日军伪警进驻后警戒步步加紧。先是限制出入校门，晚饭后不许离开宿舍，封锁了校园，夜间从三斋窗户看到敌军端着雪亮刺刀，各处布岗，有时看到人影在走动。后来听说是在抓进步反日师生。

第二天上午学生们被集中到贝公楼上礼堂，日本军官讲话。翻译后知日美已进入战时状态，日本接管燕京大学，在校学生要守纪律听指挥。不久又传出学生们可以各自归家，但每人只许一次离开，不得在校园内往返走动。我这北平有家刚入学100天的新生，宿舍内东西不多，所以只丢弃一个暖水瓶，外地高年级学生就受很

大损失。在贝公楼前草坪上，日军和伪警进行检查，将箱支包裹翻倒地上，不待你收拾，又催促快走，所以书籍衣物丢遗满地。有的女同学用绳子拖着箱子走，几个外籍教师帮助体弱女同学提东西。平日未名湖畔的波光塔影宗教楼旁宁静幽深的学习场所，都遭到狰狞日寇铁蹄践踏。多少青年学生失学流散，后来再经过燕园时大门紧闭，已挂出了“综合研究所”的牌子了。

1942年3月3日北京大学登报招生。我报名赴考。试题是“青年对于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及“和平反共建国之意义”。次日口试，主要是谈家庭状况，兴趣爱好、政治观点、学校生活等。3月8日报载录取名单。我被北大文学院语文系录取。4月28日正式上课。“燕转生”编为特班，与原校生分开上课。燕京大学教授容庚、讲师郑骞分别讲授甲骨文、唐诗宋词。因日本宪兵占用红楼，我们在灰楼上课，后才迁入红楼。当时学生中有接受党领导进步分子、有受国民党青年团影响的学生、还有一些日本留学生，其中还夹杂有日本宪兵队的“嘱托”，监视中国学生。后来不少“燕转生”经过河南新乡渡过黄河去大后方上学，特班也就归并于其他各班了。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事失利，盟国空军经常在北京上空出现，喷着四道飞行云的B29型轰炸机也经常飞越上空，最多有一次50多架。日军也不放高射炮了，战事吃紧，日寇恐怖活动也加紧，经常搜捕爱国青年，记得同班青岛来的女生孙淑顺和王某某出走后，日本宪兵曾一再搜查询问。

1944年6月26日敌伪当局对北大六院及艺专、外专学生进行统一军事训练，中队长由伪军教练员担任，小队长由清河伪军校学员担任，由王谟任训练总监，进行军事操练，听军事课，参观伪绥靖教导团军事表演，经常拉出队伍训练，男生赤着背在大街上跑步，有不少虚弱同学昏倒在街头。7月10日在东单练兵场，杜锡钧